

何以“盐豆”:明代苏浙与徽州“地讳”的解说

刘永学 胡阿祥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明清时期,各地人群皆有绰号,时称“地讳”。盐豆则本指炒熟后用盐水浸泡入味的黄豆。最晚在明前期,“盐豆”已成为苏浙人群的地讳。及至明末清初,盐豆亦指称徽州人群,因此成为苏浙与徽州人群共享的群体标签。苏浙的“盐豆”地讳起初源于饮食,再又关乎民风;徽州的“盐豆”地讳则源于饮食与民风。“盐豆”地讳的成立,关键又在苏浙、徽州的移民群体。作为“地讳”的“盐豆”,不仅折射了明代苏浙与徽州人群的社会形象,而且体现了时人的地域偏见、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

【关键词】地讳;盐豆;苏浙;徽州;地域人群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4-0109-08

What is the So-called "Salt Beans" : An Explanation of the "DiHui(地讳)" in Suzhou, Zhejiang and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LIU Yong-xue HU A-xiang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eople tended to use specific nicknames to refer to other regions and their inhabitants,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is called "DiHui". Salt beans, originally, refers to fried beans that were soaked in salt water. At the latest in the early Ming, "salt bean" had become the "Di Hui" of Suzhou and Zhejiang people, and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it also referred to Huizhou people, thus becoming a cultural label for people from Suzhou, Zhejiang and Huizhou. The "salt bean" nickname in Suzhou and Zhejiang originated from food and then it's about folk customs, while the "salt bean" nickname in Huizhou originated from food as well as folk customs. The nickname of "salt bean" was highly related to the immigrants in Suzhou, Zhejiang and Huizhou, it not only points to the social image of the people in Suzhou, Zhejiang and H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also reflects the idea of otherness, regional 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 as well as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people at the time.

Key words: DiHui; salt beans; Suzhou and Zhejiang; Huizhou; regional inhabitants

绰号是人名称谓的一种形式,属于常用型民间熟语^①。研究绰号、堪称经典的王利器先生所撰《〈水浒〉英雄的绰号》开篇即指出,“绰号意识着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部政治意义”,至于《水浒》英雄绰号的由来,文中区别为形体、性情、才能、军器等情形^②。然则个人的绰号是如此,群体的绰号也不例外。以言

【收稿日期】2022-02-20

【作者简介】刘永学(1991-),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明清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胡阿祥(1963-),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六朝博物馆馆长,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历史地理。

① 钟敬文编:《民俗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

② 王利器:《〈水浒〉英雄的绰号》,《新建设》1954年4—5月号(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利器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明清时期,所谓“地讳”,即指地域人群的群体绰号。尽管颇多的“地讳”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但这却是帝制时代客观存在而且值得关注的人文地理现象,也是观察明清社会诸多面向特别是不必讳言的“地域偏见”乃至“地域歧视”问题的优质视角,如王振忠即认为“诸多‘地讳’,以民风、饮食、物产甚至地方病等,渲染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①,萧遥天也强调“地讳”与当地人群的行为和性格特征有关^②。凡此,都给予笔者以启发。

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盐豆”,在明代众多“地讳”中可谓颇具典型代表意义,盖其指称人群既有演变与拓展,文化内涵也堪称丰富与复杂。王振忠曾指出,南方人的“盐豆”之名源于其俭啬成癖的性格,惜未展开详细论证,也未注意到指称人群的变化^③。本文则旨在梳理“盐豆”地讳的形成与传播过程,探究“盐豆”地讳的来源取义,并进而阐释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希望藉此以见明代民间语言、地域人群与社会文化之一斑。

一、苏浙、徽州的“盐豆”地讳

盐豆本指“干炒、待熟后用盐水收味的黄豆、蚕豆”^④,是东南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食物,其见载于史也颇称久远。如钱塘人吴自牧回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时言:“又沿街叫卖小儿诸般食件:……箕豆、法豆、山黄、褐青豆、盐豆儿、豆儿黄糖。”^⑤可知盐豆是南宋临安城中儿童喜食的小吃。南宋文人亦以盐豆入诗词,陆游《一年老一年》云,“下床拥火暖有余,咸豆数粒粥一盂”^⑥,清人顾雪亭认为,诗中“咸豆”即是“盐豆”^⑦。

那么此种小吃盐豆,又在何时成为苏浙“地讳”?笔者判断当不晚于明前期。如明初翰林学士为吏部尚书贺寿,只有江西人解缙来迟,众人遂打趣道:“只是腊鸡来迟,罚酒三杯。”解缙作诗调侃:“生骂江西是腊鸡,苏浙盐豆落笊箕。”^⑧而及至明中期,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呈现娱乐化和世俗化的整体走向,社会上既流行着“新开门七件事”^⑨,士人之间的社交礼仪也为之一变。既有的官方制定的维持官场体面以及官民上下尊卑的社交礼仪被打破^⑩,士人之间也常以“地讳”相互戏谑,期间,各地士人尤其是北方士人常以“盐豆”戏称苏浙人群。如成化苏州人陆容《菽园杂记》有云:“盖京师朋辈相戏,各有指斥风土所讳以为诟者。如苏浙云盐豆,江西云腊鸡,湖广云干鱼之类是已。”^⑪苏浙人群的“盐豆”之名甚至传入宫廷。明武宗西幸陕西,御史孙璋侍奉左右。“陛问曰:‘汝何省人?’曰:‘浙人。’武宗曰:‘天下各有诨名,汝浙云何?’对曰:‘无之。’武宗曰:‘独不闻盐豆之名乎?’璋谢而退……时

①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81页。

② 萧遥天:《中国人名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

③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第381页。

④ 褚半农:《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6-167页。

⑤ [宋]吴自牧撰,王旭光校注:《梦粱录》卷13《诸色杂货》,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203页。

⑥ [宋]陆游:《剑南诗稿》卷79,《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23册,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644页。

⑦ [清]顾雪亭:《土风录》卷5“盐豆”,张智主编:《中国风土志丛刊》第2册,广陵书社,2003年,第327页。

⑧ [明]书林:《解学士诗话》,中国古代孤本小说组编:《中国古代孤本小说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067页。

⑨ 此七件事为谈谐、听曲、旅游、博弈、狎妓、收藏、花虫鱼鸟。

⑩ 明初,官方制定了一套相当完善的社交礼仪,规范人们的社会交往。如洪武四年(1371)定官民揖拜礼,洪武五年(1372)重新审定官民相见礼,洪武十五年(1382)又制定了官员在路上相遇及公参礼仪,洪武三十年(1397)重新申禁官员之间的交往礼仪。另外,民间交际礼仪亦讲究长幼、贫富乃至贵贱之别。

⑪ [明]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74页。

苏之士夫，谓璋曰：‘盐豆之名，钦定在浙江矣。’”^①所谓“钦定在浙江矣”，反映了其时尽管苏浙人群同有“盐豆”绰号，但苏州人更愿意让与浙江。

晚明以降，苏浙地讳仍为“盐豆”，而且流播范围更广。清人惠栋《九曜斋笔记》引嘉靖广西人李文凤《月山丛谈》：“天下十三省，俗皆有号，莫知所始。如陕西曰豹，山西曰瓜，山东曰滕，河南曰鲈，苏浙曰盐豆，江西曰腊鸡，福建曰獭，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云贵曰象。各以是相嘲。”^②隆万之时，谈谐之风尤盛，乃至出现以谈笑而结社的现象。明末清初，张岱《陶庵梦忆》记载：“仲叔善谈谐，在京师与漏仲容、沈虎臣、韩求仲辈结噱社，喋喋数言，必绝纓喷饭。”^③又作为朝廷重臣的严讷与高拱之以“地讳”相谑，如江盈科《诸史》所记：“常熟严相公讷面麻。新郑高相公拱属文多于腹中起草。世俗笑苏州盐豆，河南蹇驴。二相相遇，高谓严曰：‘公豆在脸上。’严即应曰：‘公草在肚里。’”^④王同轨《耳谈类增》、曹臣《舌华录》、吴肃公《明语林》和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等俗文学作品也都载有这则典故。而随着这些书籍的刊刻、流传，苏州人群的“盐豆”之名更在市井百姓之间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乃至冯梦龙《笑府》调侃：“有徽客归携盐豆一瓶饷其妻者，置枕边，夜与妻合，误倾豆瓶。妻曰：‘不好了，满床都是苏州人矣。’”^⑤盐豆成了苏州人群的象征。而由“徽客归携盐豆”，又可见明末清初时，“盐豆”已不仅指称苏浙人群，亦指称徽州人群了，褚人获所集《坚瓠乙集》“各省地讳”条即云：“各省皆有地讳，莫知所始……浙及徽州曰盐豆。”^⑥于是“盐豆”成为苏、浙与徽州三地人群共享的群体绰号。

二、苏浙、徽州“盐豆”地讳的来源取义

绰号的语义来源甚多，与人物的状貌、德性、威望、身价、运命、财产、业务、技能、学识、艺术、武勇、行为、举止、臭味、谈吐、著作、服御、身份等因素有关^⑦。而属于群体绰号的“地讳”，其来源取义也与群体的以上特征有关。

以言苏州地讳之“盐豆”，明人就曾有说。明中期，苏州人戴冠考证：“《水东日记》云：‘四方人相讥谑，多以土名土俗为标榜。如南人曰蛮子，西人曰豹子之类。’予尝因是考之。如吴人曰盐豆儿。晋王武子食羊酪问陆云曰：‘吴中何以敌此？’答曰：‘千里蓴羹，未下盐豉。’意者‘盐豆’之称本于此。”^⑧即苏州“盐豆”之名源于《世说新语》中王济与陆机的对谈。杭州人郎瑛亦认为，“盐豆”与“盐豉”相近，“今呼苏人为盐豉蛮”，并进一步考证“千里蓴羹，未下盐豉”之“未下”应为“末下”，“千里”与“末下”均为苏州地名^⑨。晚明苏州人冯梦龙则直陈“苏州多食盐豆，因号盐豆为苏州人”^⑩。

今按戴冠与郎瑛的上引说法颇有不足之处。首先，“盐豉”是用黄豆煮熟霉制而成的调味品，其制法、性状都与小吃“盐豆”非为一物。其次，细味《世说新语》中陆机“恚”王济的典故，实有特殊的历史情

① [明]余永麟：《北窗琐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0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411页。

② [清]惠栋：《九曜斋笔记》卷3《十三省号》，刘世珩辑：《聚学轩丛书》，广陵书社，2009年，第719页。

③ [明]张岱撰，马荣成点校：《陶庵梦忆》卷6《噱社》，中华书局，2007年，第78页。

④ [明]江盈科撰，黄仁生校注：《雪涛小说（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

⑤ [明]冯梦龙撰，程小铭校注：《笑府》卷8《刺俗部·盐豆》，《明清笑话集六种》，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

⑥ [清]褚人获撰，李梦生点校：《坚瓠乙集》卷1，《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17页。

⑦ 大白：《绰号文学底研究》，《世界杂志》1931年第2卷第1期。

⑧ [明]戴冠：《濯纓亭笔记》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1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5页。按“陆云”系“陆机”之误，又据《晋书·陆机传》、《张翰传》，“蓴羹”即“莼羹”。

⑨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末下误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⑩ [明]冯梦龙撰，程小铭校注：《笑府》卷8《刺俗部·盐豆》，《明清笑话集六种》，第115页。

境。西晋灭吴,陆机、陆云兄弟不得已北上洛阳求官,然而文化心理上却并不示弱,北方大族则对“亡国之余”的吴姓士人心存轻视,故当出身高门的太原王济指着羊酪问陆机“卿江东何以敌此”时,陆机答曰“有千里蓴羹,但未下盐豉耳”。我们知道,蓴羹虽为江东美味,未下盐豉的蓴羹却淡而无味,不过在陆机看来,这已敌得过北人的奢侈食品羊酪了。要之,陆机所“怗”,重在强调“蓴羹”,而非“盐豉”。

与戴冠、郎瑛“掉书袋”的说法相比较,看似浅白的冯梦龙的上引说法,其实更加切近事实。这里不妨也浅白地陈述一些历史事实。在明代江南地区,豆类作物的价值不容忽视。如言农业生产,因为豆饼具有极高的肥料价值,所以能够满足水稻、桑树等生长过程中的需要^①。而虽然芝麻、菜子榨油后也可制作豆饼,但“油多饼少。豆子榨油,油少饼多”^②,故时人多用豆子制成豆饼。江南农业生产对豆饼的依赖,又刺激了对豆类作物的需求。明代以降,江南地区主要通过大运河从华北地区购买大豆^③,也注重本地豆类作物的栽培,苏州地区种植的豆类作物就有大豆、小豆、白匾豆(苏州人称为“延篱豆”)、豌豆、紫罗豆、蚕豆、江豆、刀豆等^④,龙爪豆还是“止生于苏州地方,别处却无”^⑤。再言日常生活。所谓“豆之为用也,油腐而外,喂马、溉田,耗用之数,几与米等”^⑥,这也包括了制作盐豆。元末明初,苏州人韩奕详细记载了盐豆的制作方法:“大新黄豆一升淘净。先以白盐三钱、甘草三钱、乌梅一钱,煎浓汁去粗,停冷再温,量分多少许,浸豆至半生半熟。余汤下锅子齐平,猛火烧至汤干,更于火上焙之。”^⑦如此看来,诚如冯梦龙之言,因为明代苏州人群“多食盐豆”,故外地人“号盐豆为苏州人”。

上述苏州“盐豆”地讳不是得自陆机与王济相“怗”的轶闻故事,证之以浙江人群的“盐豆”地讳,又会更加清楚。嘉靖时人余永麟称:“盖‘盐豆’之名,本于苏州,浙相连,得通称故耳。”^⑧明代有俗谚:“上说天堂,下说苏杭。”^⑨苏南与浙西在地形、地貌、水文、气候以及交通状况、产业类型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历史上这些区域之间人们往来较多,共同构成了经济、文化、交通联系紧密的江南水乡区”^⑩。又浙江都会杭州自南宋时便流行盐豆小吃,即盐豆也是杭州人群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食物,加之苏南与浙西地缘相近、地域相连,所以共享了“盐豆”之名。

值得注意的是,徽州“盐豆”地讳的由来,既与苏浙事类而理同,即有徽州人群饮食习惯的背景,更与当地独特的民风习性有关。先说饮食习惯。徽州地区也广泛种植豆类作物。如《新安竹枝词》,“红苕调灰种塍田,落苏扁荚竹篱边。枯松高架北瓜络,羊角签排豆蔓牵”,原注“羊角即豇豆”^⑪,而“扁荚”即扁豆荚。徽州名菜“笋豆”“腊八豆腐”“毛豆腐”“虎皮豆腐”等皆用豆类原料制成。又徽州流传一句谚语:

① 李伯重曾以《沈氏农书》的记载为数据来源,考证了明代中后期湖州地区水稻和蚕桑生产的各项投入,其中水稻所需肥料为160斤/亩,桑业所需肥料为750斤/亩;水稻肥料的白银支出为0.55两/亩,桑业肥料的白银支出为1.05两/亩。参见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

② [明]陈眉公:《致富奇书广集·杂粮统论》,转引自王连铮、郭庆元主编:《现代中国大豆》,金盾出版社,2007年,第614页。

③ 王保宁、耿雪珽:《利从江南来: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豆类作物更替》,《中国农史》2022年第2期。

④ 洪武《苏州府志》,《江苏历代方志全书·苏州府部》第5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390页;正德《姑苏志》,《江苏历代方志全书·苏州府部》第7册,第110页。

⑤ [清]艾衲居士撰,茂山点校:《豆棚闲话》卷2《虎丘山贾清客联盟》,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80页。

⑥ [清]叶梦珠撰,来新夏点校:《阅世编》卷7《食货二》,中华书局,2007年,第176页。

⑦ [明]韩奕:《易牙遗意》卷下《盐豆》,《续修四库全书》第1115册,第637页。

⑧ [明]余永麟:《北窗琐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0册,第411页。

⑨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22《辩证类·苏杭湖》,第230页。

⑩ 朱海滨:《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109页。

⑪ 许承尧撰,李明回、彭超、张爱琴点校:《歙事闲谭》卷7《新安竹枝词》,黄山书社,2001年,第207-208页。

“家有千钟粟，不吃盐豆和粥。”^①徽州人群虽然喜爱盐豆，却并不舍得食用，而这就涉及民风习性了。

徽州地区民风素以节俭著称。嘉靖《徽州府志》记载，“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饘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其啬日日以甚”，徽州女人“尤好能俭，居乡者数月，不沾鱼肉”^②。外地人则对徽州人群的俭啬性格多持批判态度^③。万历福建人谢肇淛嘲弄道：徽商“娶妾、宿伎、争讼，则挥金如土”，然而“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羹，欣然一饱矣……至其非服恶食，纤啬委琐（猥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④。素以奢靡著称的江南文人更多调侃。如冯梦龙《笑府》曰：“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得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闳（噪）。’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嚙曰：‘我也败些家当罢了！’”^⑤如此每餐“不得过数粒”盐豆的徽人，的确极言其吝啬。又据此可知及至明末，“盐豆”已经具备了新的文化意涵，即成为人性吝啬的代名词，也标示了外地人眼里的徽州人群的特征。

徽州人群的民风节俭有其乡土背景。作为历史地理概念的徽州，地处皖南，辖有歙、休宁、黟、祁门、绩溪、婺源六县^⑥；其地理环境为“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徽州地区土地贫瘠，加之地狭人稠，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这既养成了徽州人勤俭持家的习惯，也造就了徽州人以“徽骆驼”自喻其拼搏奋进、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这种创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外出经商成为徽州人谋生的主要途径，徽商也因此成为明清商业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性商帮群体。而在徽商与其他地域人群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徽人多吝”的性格特征得以放大与凸显，遂被其他地域人群赋予了“盐豆”的绰号。

综上所述，苏浙的“盐豆”地讳源于饮食，徽州的“盐豆”地讳源于饮食与民风，那么两相比较，饮食与民风二者又孰重孰轻呢？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盐豆”地讳所指称的具体人群。

苏浙与徽州人群喜食盐豆，不仅与其地不乏乃至多有豆类作物有关，更联系着这些地方特殊的移民群体。溯之明初，朱元璋即因苏州地区的富民曾经支持过张士诚，以及构建“辨贵贱、明等威”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对苏浙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整饬，并且强制迁移大量人口充实京师。如据曹树基的估算，仅仅洪武年间，苏南及浙江向外输出人口即达64万，徽州府向外输出人口亦达29万^⑦。及至明中叶以降，苏浙地区赋役沉重，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江南人为谋求生计，又多弃农经商，所谓京师“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⑧。成化、弘治年间苏州的洞庭商人凭舟楫为艺，转输四方，所经营的货物包括棉布、粮食、丝绸、木材、蓝靛、药材、南北特产、书籍，无所不营，除大量转输货物外，也经营典当铺子^⑨。浙东人多游食他方，如京师小唱，“大抵此辈俱浙之宁波人”^⑩；京师胥吏更多由绍兴人充任，“自九

① 程法德：《胡适与我家的亲缘与情缘》，载《杭州徽学通讯》1991年1月，转引自王振忠：《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② 嘉靖《徽州府志》卷2“风俗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9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③ 参见卞利：《论徽州本土和域外对徽商形象认同的差异及其原因》，《学术界》2019年第4期。

④ [明]谢肇淛撰，张秉国校笺：《五杂俎》卷4《地部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9-130页。

⑤ [明]冯梦龙撰，程小铭校注：《笑府》卷8《刺俗部·盐豆》，《明清笑话集六种》，第114页。

⑥ 徽州一府六县的格局，奠定于唐大历五年（770），是年，歙州辖此六县。北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元为徽州路；元末、明、清为徽州府。虽称州称路或称府，但辖六县不变，且维持近1200年之久。

⑦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8页。

⑧ [明]张瀚撰，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第76页。

⑨ 参见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新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马学强：《钻天洞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56页。

⑩ [明]沈德符撰，杨万里点校：《万历野获编》卷24《小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明代笔记小说大观》，2551页。

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①徽州地区外出经商者更如过江之鲫,“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樵转毂,以遨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伙,故贾人几遍天下。”^②按在迁移流传、长途跋涉中,盐豆因其不易变质的特性,易于保存的优点,可以充蔬代谷,此等情形,诚如嘉靖李开先所作传奇《林冲宝剑记》的记载:林冲早年游历四方之时,十分落魄,“旧网巾前低后高,破布衫缠腰裹膝。盐豆儿随路干粮,干鱼头客边口味。”^③如此,盐豆既成为求生在外、经商四方的苏浙与徽州人群喜爱的携带之物、乡愁的“莼鲈之思”,“盐豆”也成为外地人眼里的苏浙与徽州人群的典型符号,乃至带有戏谑色彩的“地讳”。

三、苏浙、徽州“盐豆”地讳的社会文化功能

语言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语言的隐喻往往折射了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语言隐喻中的地讳,不仅是对群体的称呼,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地讳生动传神、富有趣味,往往比籍贯更容易让外人记住,更易于广泛传播,对群体和社会也更容易造成影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地讳从别样的角度呈现了社会观念与社会关系的概貌及其变迁,也从鲜活的侧面反映了大众的心理特征。具体到“盐豆”这个地讳,它所折射的苏浙与徽州人群的社会形象、时人对苏浙和徽州的地域偏见,以及士人与大众对贪吝之风的批判,都是引人注目、所系匪浅的社会文化功能。

(一)群体形象的标识

地讳总是凝聚着地域人群的典型特征,“盐豆”即把苏浙与徽州人群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概括、凸显乃至放大了出来,它使听者立刻可以据此判断出对应群体的标志形象,也成了晚明笔记小说中塑造徽州人群“吝嗇”与苏浙人群“富吝”的典型文学意象^④。如艾衲居士《豆棚闲话》描写徽商汪彦、汪华父子经商历程时写道:汪彦十五六岁跟随伙计学做生意,“徽州风俗,原世朴实,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是个一文不舍,一文不用”;汪华十六岁亦要学做生意,凑足不菲的“一万两”作为本钱,随身物品则“未免照例备了些腌菜干、猪油罐、炒豆瓶子,欢欢喜喜出了门”^⑤,这是徽州人群的“吝嗇”。而嘉靖时徽州人叶权记载苏州某僧“业医,颇有费,而出纳甚吝”,后被吴中少年用计所辱^⑥;又万历时湖南桃源人江盈科仕宦于苏州,见“有徐氏者资累数十万。其两宫灾,营建孔亟,吴中奸民欲藉端以罢金穴,遂籍江左巨户凡若干人,谓且入奏。徐氏与焉,闻而病咽以郁死”^⑦;又冯梦龙《古今笑》所述苏州人归廉泉的事迹:“吴人归副使廉泉(大道),富吝俱极,暑月曝水日中浴之,省爨薪也。生平家食未尝御肉,客至未尝留款。一日,有内亲从远方来,必欲同饭,乃解袖中帨角上五钱,使人于熟店批数片肉。肉至无酱,复解一钱市得。便嫌其不佳,使还之,仍取钱。已问:‘酱樸何在?尚有余咸味,足消此肉也。’”^⑧冯梦龙还记载

① [明]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77页。

② [明]张瀚撰,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第83页。

③ [明]李开先:《新编林冲宝剑记》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774册,第262页。

④ 关于明清时期徽州人群尤其是徽商社会形象的研究,参见王振忠:《明清时期徽商社会形象的文化透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刘艳琴:《明代话本小说的徽商形象》,《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4期;李琳琦、孟醒:《明清小说与历史文献中的徽商形象之比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⑤ [清]艾衲居士撰,茂山点校:《豆棚闲话》卷3《朝奉郎挥金倡霸》,第18-19页。

⑥ [明]叶权撰:《贤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6页。

⑦ [明]江盈科撰,黄仁生校注:《雪涛小说(外四种)》,第65页。

⑧ [明]冯梦龙撰,李晓、爱萍点校:《古今笑》卷12《贫俭部·归廉泉》,李晓、爱萍主编:《明清笑话十种》,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

了浙江金华豪民李甲因吝致祸的悲剧故事:李甲“克众肥家”,李甲之妻则时常施舍僧人。李甲得知后,因吝惜财物,置毒于四饼中,施舍二僧,僧人怀饼归寺。翌日,李甲二子入寺游观,误食毒饼,竟至殒命^①。这是苏浙人群的“富吝”。然则无论是徽州人群的“吝嗇”,还是苏浙人群的“富吝”,“盐豆”地讳所承载的吝啬的群体形象,成为时人共享的地域人群认知,也体现了时人将苏浙与徽州人群视为同一地域群体的社会思想观念。虽然苏州和徽州隶属南直隶,为府级政区,浙江为省级政区,但苏州府、徽州府、浙江省三者在自然地理、人文环境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性。如苏浙地形以平原、低山丘陵为主,河网密布,水道交通便利,人群之间交往密切;徽州与浙江淳安等地,“不仅同属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异”^②;另外,徽州人群经由徽杭古道和新安江等,落脚杭州、苏州等地区,寄居苏州和浙江者众多,彼此之间社会习俗互相浸染。凡此,又都显示了文化分区以及自然分区、经济分区对行政分区的突破与超越,这是值得深思的政治地理现象。

(二)地域观念的呈现

地讳往往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如前引河南新郑人高拱与苏州常熟人严讷以“盐豆”与“蹇驴”相戏谑,即体现了两地人群因为地域差异所导致的地域偏见。明代地域人群之间的文化差异,从大处说,尤以长江南北为显著。如弘治元年(1488),朝鲜人崔溥称:江南和顺,兄弟同居,自吴江县以北,若父子异居必遭人非议;江北人心强悍,山东以北,“一家不相保,斗殴之声,炮闹不绝,或多有劫盗杀人”^③。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④。当时苏州地区经济发达,“其民利鱼稻之饶,居果布之凑,造作精靡,以绾谷四方。”^⑤苏州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苏州人认为俗者,则四方随而俗之^⑥。苏州人技艺精致甲天下,也擅长造假古董,“故吴中有‘宋板《大明律》’之谣,盖以讥夫假古器耳。”^⑦时人评价苏州人群“僇巧而俗侈靡”^⑧。至于江北的中州地区,则经济生产仍以农业为主,“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⑨诸如此类的苏州与河南之间,乃至禹迹九州个别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遂致彼此之间互生轻视之心、易造戏谑之词,对此我们今人应予以理解的同情,而丰富多彩且多变迁的地讳,也就缘此而产生了^⑩。

(三)价值观念的传递

地讳既因地域人群之间的差异性比较而产生,则必然在诸多方面反映了时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以徽州“盐豆”地讳为例,即蕴含了士人与大众鄙视贪吝的观念与取向。按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风气也在悄然变化。正德以前,在朝廷的倡导下,各地民风总体而言是质朴淳厚的,

① [明]冯梦龙撰,李尧、爱萍点校:《古今笑》卷13《贫俭部·吝祸》,李尧、爱萍主编:《明清笑话十种》,第278页。

② 王振忠:《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

③ 朴元燧校注:《崔溥漂海录校注》卷3,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65页。

④ [明]张瀚撰,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第79页。

⑤ [明]章潢:《图书编》卷36《三吴风俗》,广陵书社,2011年,第1416页。

⑥ [明]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广志绎》卷2《两都》,第228页。

⑦ [明]江盈科撰,黄仁生校注:《雪涛小说(外四种)》,第46页。

⑧ [明]谢肇淛撰,张秉国校笺:《五杂俎》卷3《地部一》,第88页。按苏州民风之“侈靡”有其形成过程。如成化苏州人王鏊称:明初苏州“邑里萧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年间稍稍复兴,“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叠盒,交驰于通衢……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明]王鏊撰,张德信点校:《寓圃杂记》卷5“吴中近年之盛”,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关于江南社会风气由淳朴转为奢靡的研究,参见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今江、浙地区为例》,《明清社会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48页;陈宝良:《明代社会风俗的历史转向》,《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

⑨ [明]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第234页。

⑩ 参见胡阿祥:《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学海》2009年第1期。

颇有三代之风。正德以后,则是追求生活日奢,日常艳丽,崇利之风日盛一日。随之,时人既有不少关于金钱的题咏,如“人为你跋山渡河,人为你觅虎寻豺,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人为你名亏行损,人为你断义幸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①;顾炎武更把当时的人情世风归纳为“三反”,即“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②。又民间流传着各种“奇谈怪论”,如“大凡富人,没有一个不吝啬的。惟其看钱财如同性命一般,宝惜倍至,所以钱神有灵,甘心跟着他走。若是把来不看在眼里,东手接来西手去的,触了钱神嗔怒,岂肯到他手里来?故此非慳不成富家,才是富家一定慳了”^③;民间文学中的吝啬鬼形象也逐渐增多,如冯梦龙《古今小说》刻画的张员外:“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这个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还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做磬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篋儿。人见他一文不使,起他一个异名,唤作‘禁魂张员外’。”^④这张员外后来被侠盗宋四公戏弄,自缢而死。冯梦龙为张员外设计了悲惨的结局,盖以此抨击当时的贪吝之风也。然则徽州人群、苏浙人群的“盐豆”地讳,正是时人抨击贪吝的社会心态与道德形象的体现吧。只是社会与道德的复杂之处,又诚如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所描述的明代士大夫的精神面貌:“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进取者乎?有不贪生畏死、择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谗恶谤、党同伐异者乎?有不上人求胜、悦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谄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舆、行无顾虑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我未之见也。”^⑤如此,我们欲求真切理解这诸多“地讳”的社会文化功能,又真可谓学术研究空间甚大,乃至令人有“开卷如芝麻开门”的感叹!

结 语

明代各地人群皆有绰号,时称“地讳”。具体到“盐豆”地讳,先则苏浙人群,再则徽州人群,及至明末清初,“盐豆”最终成为苏浙人群与徽州人群共享的群体标签。这样的群体标签之于苏州,源于其人喜食盐豆的饮食习俗;之于浙江,源于苏浙地缘相近、地域相连;之于徽州,则源于其人食用盐豆的饮食习俗与节俭吝啬的民风习性;又之于后来的苏浙人群,也凸显了其人群中不乏过分的“富吝”者。而作为语言隐喻的“地讳”与基础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民俗之互相涵化,又是解说苏浙人群与徽州人群“盐豆”地讳的关键线索。苏浙与徽州的“盐豆”地讳,折射了时人因地域差异所引发的地域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相应时代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并承载着时人对苏浙与徽州文化的感知认知和集体记忆。

推而论之,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明清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变迁尤为剧烈,被学者称为“晚明大变局”^⑥。而在这样的大变局中,许多名词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观察这些名词,我们可以亲近其时的社会生活、寻迹其人的文化观念。即以明代“地讳”言,就为研究明代民俗语言和社会文化提供了别样的材料与崭新的视角。本文所尝试者,虽然只是“盐豆”一例,但地讳研究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特别的魅力、广阔而且发散的空间,已经可见一斑了。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明]薛论道:《林石逸兴》卷5《沉醉东风·题钱》,《续修四库全书》第1739册,第142页。

② [明]顾炎武撰,严文儒、戴扬本点校:《日知录》卷13“三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55页。

③ [明]凌濛初撰,陈迥冬、郭隽杰点校:《二刻拍案惊奇》卷33《杨抽马甘请杖,富家郎浪受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98页。

④ [明]冯梦龙撰,许政杨校注:《喻世明言》卷36《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60页。

⑤ [明]谢肇淛撰,张秉国校笺:《五杂俎》卷13《事部一》,第437页。

⑥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年。